周平，渠涛. 返迁劳动力收入影响研究：一个国外综述视角［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2）：1-8.
ZHOU Ping，QU Tao. Research on the income impact of the returned labor force：a perspective of foreign review［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2，21（2）：1-8.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2.02.001

返迁劳动力收入影响研究：一个国外综述视角

周平，渠涛
（山东财经大学 区域经济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劳动力返迁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此领域在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具有较强影响力。因此，通过文献回顾和学术综述，明确了返迁现象的实质是劳动力转移的伴随行为，为一系列“力”作用的结果。返迁劳动力具有外出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的双重属性，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其收入影响因素中，返迁决策因素为重要的间接影响因素，而个体适应性、返迁地作用及劳动力特征为直接影响因素，包括具有特殊意义的群体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创业就业环境因素。

关键词：移民；劳动力转移；返迁决策；群体特性；收入影响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2）02-0001-08

近年来，我国农民工总量内部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至2020年十年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虽然农民工数量由2011年的25 278万人增加至2020年的28 560万人，但同时，数量增速由2011年的4.4%下降至2020年的-1.8%，呈逐年下降趋势。进一步区分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即外出农民工，2020年数量为16 959万人，已回落至接近2011年的15 963万人的数量水平。另一方面，本地农民工数量有所增加，从2011年的9415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11 601万人。同时，外地农民工占比逐年下降，本地农民工占比逐年上升，由2011年的37.2%上升至2020年的40.6%。十年间，新增农民工数量合计为3282万人，其中新增本地农民工为2186万人，占比达到66.6%。本地农民工是返乡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国内，外出劳动力的返迁主体可以用返迁劳动力、返乡劳动力、返乡农民工等进行置换，主要指返回非城镇户口所在地（县乡镇村）创业或就业、外出务工时间超过6个月的农村转移劳动力[1]。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或移民迁移过程中，始终存在返乡返迁的回流现象，相关研究也成为劳动力转移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外研究发轫于19世纪末，多以返迁家乡的移民为研究对象，返迁行为多以移民迁移潮流中伴随的反向迁移问题来对待，从研究返迁行为及其收入影响因素入手触及收入问题的本质，相关研究起步较早，从不同视角直接或间接地触及其收入影响问题。与此相比，国内相关成果较少，尤其当研究视角聚焦于回流家乡的农村外出劳动力即返乡劳动力收入影响问题时，研究成果鲜见。这与返乡劳动力的群体特征多元且难以把握、收入影响因素繁杂、收入传统动能薄弱等原因有关。因此，本研究利用学术综述的研究方法，梳理探讨国外相关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成果，从揭示国外移民的返迁行为入手，探讨其行为价值及收入影响因素，以期为我国返乡劳动力收入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一、时间线索和标志性成果

（一）学术史梳理

19世纪之前，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及劳动生

收稿日期：2021-10-23 **修回日期：**2021-11-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进程中返乡劳动力增收影响因素与保障机制研究”（19BJY150）
作者简介：周平，研究方向：农村劳动力转移。

产方式的转变，配第和李嘉图等人的经济学研究中已经开始触及劳动力转移的思想。其后，顺从时间脉络，相关学者贡献了一系列划时代的理论研究成果，从推拉理论到二元经济理论，再到其后的从个人福利、家庭战略、社会结构、社会网络等多元视角探讨劳动力迁移决策机制的研究成果。以上成果中触及和内含了有关返迁劳动力及其收入问题的研究。按照时间线索，可以分为四个研究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之前。由于特定时期和特定背景，这个阶段研究成果的最主要特征为劳动力本身并非这个时期研究对象的主体，研究对象多为移民返回母国的返迁劳动力，返迁行为也并非作为主流观察客体出现于劳动力转移研究之中，其研究结果中虽然暗含返迁及返迁劳动力收入的影响因素，但由于返迁始终为研究对象的伴随性存在，因此，在研究成果总量中，返迁研究所占比例非常低。

第二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研究对象依然以移民的返迁劳动力为主，开始出现以农村转移劳动力为对象的研究。这个时期是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并基本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的重要阶段，当转移方向设定为农村（农业部门）向城市（工业部门）时，行为表现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社会流动，这也是农村劳动力对于生存机制变迁的理性反应。这个时期，在理论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研究达到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高度，许多经典的原创性劳动力转移理论都是在这个时期产生和成熟起来的。当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城乡一体化程度高且城乡差别小，返迁只用于研究的反事实行为，返迁劳动力的相关研究成果依然较少。

第三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末。劳动力转移理论更加成熟，其研究对象有所扩展，返迁劳动力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绝大多数国家进行了世界范围的产业二次转移，其结果进一步促进了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大范围流动。在此背景下，这个期间出现一系列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经典理论研究成果，如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新迁移经济理论、生命周期理论、结构主义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等。这些研究成果中，研究对象依然照准于转移劳动力，同时，更加关注出现的移动方向上规模性反向迁移，此时，当研究内容为返迁劳动力职业选择以及创业就业等影响因素时，研究内容会间接或直接关联于收入问题，而成为返迁劳动力收入研究的重要参照。

第四阶段为21世纪之后。研究区域对象更多的转向发展中国家。理论上而言，刘易斯第二个转折点后，进入拉尼斯-费阶段，即单向转移逐渐成为双向移动，可出现持续性返迁现象。这个过程中，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研究内容聚焦于返迁劳动力创业就业的影响因素，而这些影响因素所产生的一个结果为收入水平，即返迁劳动力收入水平源于创业就业影响因素的作用结果。因此，这个时期的诸多研究结果会涉及返迁劳动力及其收入问题。

上述四个研究阶段，每一个阶段会围绕某个研究主题形成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但许多研究主题会跨越几个阶段甚至所有阶段而展现一个动态的学术历程。

（二）相关经典理论

不论是国际移民还是农村劳动力迁移，其迁移的最主要动机是追求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这是“推力—拉力”之间一系列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此为赫伯尔（Herberle）的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的核心论点[2]。其后，博格（Bogue）、李（Lee）、巴格纳（Bagne）等学者均对推拉理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完善和补充。劳动力移动是迁入地的拉力、排斥力与迁出地的推力、吸引力之间作用的结果，其目的指向是追求更高满意度的生活。因此，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条件下，无论是人口迁移还是移民返迁，都可以通过迁移改善处境，迁入地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因素为拉力，迁出地的不利条件因素为推力，迁移动力由拉力和推力两种前拉后推的力量共同构成。当然，迁入地和迁出地各自也都包含推与拉的两种力量，即出入双方同时存在吸引和排斥两种作用力量，双方之间还会存在中间障碍因素，如双方的文化、生活习俗等差异也会成为移动影响因素[3]。推拉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但其结论同样适用对劳动力返迁现象的理论解释。

当然，为从理论上进一步解释劳动力转移现象，除推拉理论外，还出现一系列经典且产生重大影响力的理论研究成果。其中，二元经济结构系统理论最具代表性，它是由发展经济学中三个最具独创性的经典理论构成，分别是刘易斯模型（Lewis model）、拉尼斯-费模型（Ranis-Fei model）和托达罗模型（Todaro model），这些理论为劳动力返迁及其收入影响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石。如刘易斯所言，迁移原因是因为工业部门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4-5]，当工业部门用农业部门或农村置换时，暗含着转移劳动力返回迁出地即返迁的可能性。托达罗认为移动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城市可以为农村转移劳动力提供较高收入水平期望[6]，这里同样暗含当期望收入水平降低时可导致农村劳动力作出返迁决策。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西方国家产业的全球二次转移，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大范围流动，新迁移经济理论、生命周期理论、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结构主义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等从迁移成本、家庭福利最大化、个体追求福利最大化、社会经济结构框架、社会资本等方面研究劳动力转移动因，研究结果也延展至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等方面。当研究指向以多个视角触及返迁现实时，返迁决策等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其中，迁入与迁出两地的相对价格水平和收入水平、人力资本积累的可用性、迁移者主观偏好等为主要决策依据，返迁后的工作机会、工作环境、迁移距离、失业保险以及实际收入等因素影响返迁决策，返迁决定对其收入水平产生影响[7]。

总之，对劳动力转移研究来说，“收入追求”的观点被广泛接受，收入是其重要的变量因素。同样，返迁作为劳动力转移的反事实参照物，既有与外出劳动力相同的预期等收入影响因素，也存在其特定性因素。

二、间接影响：返迁决策因素

关于移民返迁的研究，特别是在2000年之前，关注点多集中于迁移动机、迁移过程、迁入地融合等方面，有关收入问题研究的成果较为鲜见。但是，由于返迁意愿、返迁动机以及返迁原因与其客居时间长度，尤其是与其个体特性有关，这些因素影响返迁后收入预期，而收入预期可以作用于收入水平影响因素，并传导至收入，产生收入水平变化结果。

（一）返迁意愿

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经过多次工业革命，其劳动力转移时期十分短暂，随着城市化建设目标的快速实现，农村转移劳动力几乎是“跳跃式”[8]一步到位。因此，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及返乡劳动力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相对较少，其研究对象也多集中于返回母国的国际移民（返迁者）。英国学者拉文斯坦（Ravenstein）的《人口迁移规律》被认为是最早涉及返迁劳动力的研究成果，其研究赴美淘金的欧洲移民族群时发现，赴美最大动机是追求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当无法完全满足这个条件时，约25%的移民返回母国，即“每一个迁移潮流都会产生一个补偿性的反向迁移源流”[9]。美国是最具代表性的移民国家，移民对其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移民的永久定居和文化适应也是他们“意图失败”的证据[10]。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美国的大城市及其周边卫星城市，曾出现过劳动力回流农村的“返迁潮”[11]。1975—2000年期间，全球国际移民人口数量达到1.75亿人，占同期全球平均人口的2.9%，同时，返迁劳动力数量也在增加，而且这个现象无法完全用经典理论中的“收入最大化”来解释[12]。返迁决策与客居时间长度相关外，还与海外消费水平与家庭“终生消费保障”[13]之间的边际效用成本有显著关系，客居时间较长、有一定资本积累者，其后的收入水平有相对稳定的保障[14]。

从上看出，经济因素之外，当社会因素通过影响移民在迁移国中发展预期时，社区参与度、生活适应度、身份认同等因素形成返迁推力，并影响其返迁意愿。从收入因素看，返迁本身可以提示相对收入的变化甚至其决策变化。当预期收入水平成为返迁决策最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时，返迁决策研究产生返迁劳动力收入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石作用。

（二）返迁动机

实证研究证实，返迁动机具有多样性，主要包括：生活改善预期无法实现或迁出地出现更好的投资机会时产生的返迁；返迁可实现社会、家庭、功能和伴侣导向等行为价值；规避劳动力市

场、经济发展周期以及生命周期的影响[15]；个体能力可以决定返迁决策和返迁价值；来自于家庭经济援助越多的男性移民越倾向于返迁[16]。当然，还存在其他返迁原因。譬如，当存在无法克服的一些消极因素时，出现劳动力返迁，这些消极因素包括男性移民无法获得工作机会、女性移民婚姻失败、自身健康状况不佳、受教育水平较低等。另一方面，经济条件、个人声誉以及家庭压力等因素也可以成为阻碍中青年劳动力返迁的重要因素[17]。

国际移民研究中，不可避免的涉及到永久定居权问题。根据是否持有永久定居权，国际移民分为永久性迁移和临时性迁移两种类型。返迁多发生于“一次迁移决策”的临时性迁移过程中，其更注重储蓄或者汇款，以便为返迁进行资本积累。当临时性迁移形成多次循环迁移时，移民的客居时间对返迁决策有显著正向影响，迁移持续时间比平均水平每增加1年，选择返迁回流的概率降低2.2%[18]。对照移民类型，返迁劳动力可被分为主动返迁和被动返迁两种类型，前者外迁目的为积累资金、获取劳动技能和技术，目标实现后做出返迁决策；后者指有永久性迁移意愿，由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以及“乡愁情结”、基于对某方面失败失意的调整、新情境新机遇下即时性决策等原因的返迁。也存在无具体迁移预期或者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上存在的不同返迁行为，尤其是具有较高技能者，其返迁多与家庭、生活方式等因素有关，并非遵循效用最大化原则的收入因素[19]。

以上说明，返迁动机可以对其返迁后收入获取动力产生影响，其结果决定其收入水平。因此，拥有较高收入水平的外出劳动力，其创业动机较为强烈，在全体创业者中占比较高。同时，返迁动机会受到“拉力”影响，其影响强度增加，则对返迁数量、人口学结构和个体特性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导致收入水平变化。

（三）返迁动因

首先是经济因素。此因素的动因表现形式以主动性返迁为主，也存在由于东道国经济衰退而导致的大规模的被动返迁，人力资本较低的移民在收入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更倾向于返迁[20]。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劳动力转移过程为倒U型曲线，初始阶段，填补收入差距以及追求外向型社会结构的动机强烈，随着期望收入水平降低、收入差距缩小，可出现持续性返迁。与外出劳动时相比，返迁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不存在显著性差异[21]。

其次是非经济因素，主要包括社会因素和政策因素。社会因素方面，影响劳动力移动的因素有家庭结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迁入地融入程度等[22]。当家庭处于离散状态，获得一定经济积累的中年人，其“根联式”返迁显示了社会关系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并且，外出时和返迁后的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23]。政策原因也是返迁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在被动返迁中，当政策因素中包含收入保障内容时，返迁成为其反向追求收入效应的一种选择[24]。经典案例是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日本，在具有一定收入援助内容的入国管理政策下，曾出现移民南美的日本人或其后裔的“日系人”（Nikkeijin）的“返日潮”[25]。

前有所述，农村劳动力转移中，跨过刘易斯第二转折点，进入拉尼斯-费阶段后，单向转移逐渐变为双向流动，两者之间的收入水平变为趋同时，可出现持续性返迁行为。返迁过程中，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均为影响返迁劳动力收入的重要因素。其中，常见的“根联式”返迁提示，除经济因素外，社会关系影响因素同样具有重要性。对此，虽然国外对我国返乡农民工的研究成果较为偶见，但也有研究提示了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如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越低，越容易发生返迁[26]。

三、直接影响：群体特性

（一）重新适应性

首先，返迁劳动力的重新适应性结果对其收入产生影响。在人力资本一定的条件下，考虑劳动力自身的特定因素，返迁后收入会受到个体重新适应的影响。用于评价重新适应性的条件因素包括：创业情景或就业工作状况、结果，返迁后的居住条件，是否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参加当地社区组织等社会组织情况等。也可以通过量表测度评估自身幸福感知程度、自我适应容许程度等情况，评价重新适应程度。对爱尔兰返迁劳动力的研究表明，由于返迁后重新适应程度较

低，约20%的人非常愿意重新回到原来的客居国家，如美国、英国等。这种情况被称为返迁不满或返迁失调现象，是长期脱离母国后面对二次社会文化冲击所产生的非适应性症结，其结果是通过影响其创业就业，进而对其收入水平产生影响[27]。

（二）返迁地作用效应

移民返迁尤其出现大规模返迁时，主要通过作用于当地经济水平和社会结构对其收入产生影响，可分为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尤其当返迁地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时，返迁会推高失业率，降低人均收入。但上述影响在时间上有时是较为短暂的，长期看不但不影响就业率，还可以通过增加资本供给，同时还可以提升包括知识、工作技能和生活经验在内的人力资本水平，填补专业化职位空缺，其创业活动以及自营职业活动还可以改善就业基础、提高现有服务规模和水平，最终，提高当地生产水平和人均收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当然，如果所拥有的资本无法有效利用时，对当地经济发展无法产生长期的积极影响[28]。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包括，增加短期和长期人口，提升知识、技能及生活经验等人力资本水平，产生“智力获取”效果，利于减轻社会不平等，增加社会结构稳定性。另一方面，返迁劳动力的差异化社会优势和经济优势，有时会加剧不平等，引起当地的不满甚至仇恨，影响社会稳定性，其结果会对其收入产生不利影响[29]。

（三）职业选择偏好

在探讨返迁劳动力收入问题时，可以以职业选择为切入点，职业选择结果是影响其收入的最直接因素。职业选择首先面临职业信息的获取成本，劳动力市场信息需求增加会显著增加职业搜寻成本[30]。而职业选择影响因素主要有生命阶段因素、人力资本因素等。返迁劳动力中，年轻人比老年人拥有更多的就业选择和更高的工资报酬，生命阶段和人力资本积累都对职业选择产生影响，拥有技能或高等教育学历者，更易融入家乡的劳动力市场，获取较好工作机会，形成稳定就业和获取稳定收入[31]。

市场经济背景下，返迁劳动力的职业选择可分为自雇、自主经营和工资性从业经营三种形式，这些形式表现劳动主体自主性，并在行动内容、行动边界和行动文化蕴涵方面体现差异[32]。自雇经营和自主经营一般指个体经营、小企业等小规模经济组织，也可是较大规模的经济组织，既强调劳动力市场上的雇佣关系，也包含自雇创业、自主经营创业等形式，按照就业领域区分，还可以分为农业和非农就业。与返迁地无外出务工经验的人相比，返迁劳动力具有较强创业偏好和企业家志向，这种偏好是这个群体固有属性在就业行为中的体现[33]。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同样也显示出较强的这种偏好，倾向于自主经营和自主创业，尤其在创办中小企业方面能力显著，其中，约30%的返迁移民选择创业，这部分人往往可以在返迁地获取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34]。当然，创业选择并非持续性的或者并非永久性职业选择行为，这样的结果往往取决于创业目标的实现程度[35]。

从上看出，在如何降低职业获取成本方面，社会网络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可以有效降低职业搜寻成本，这也是迁移劳动力形成多重循环移动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市场上，返迁劳动力把创业视为识别机会的能力，倾向于非农自主创业形式从事职业活动，利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相对优势，以期为其创造财富，并对当地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四）劳动力特征

群体特征。劳动力特征与返迁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家庭人口因素等群体特征密切相关，并决定其返迁后的群体收入水平，尤其是返迁创业中，即使不具有更高的风险偏好，但群体风险承担能力及不确定环境容忍度较高，创业目标包括提高平均收入目标的期望程度，可获取平均收入的增长[36]。同时，返迁劳动力多具有创业管理者定位，提高收入水平需要创业绩效作保障，而创业绩效会受到管理者意识和能力的影响[37]。

人力资本。外出务工过程中，劳动力人力资本得到不断积累，加之鼓励劳动力返迁就业和创业媒介的存在，可促进劳动力返迁。并且，他们可根据自己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决定职业选择，人力资本与创业就业类型及行业密切相关。现实中，人力资本积累相对较少的返迁劳动力创

业者，多致力于传统产业领域的生存型创业，如批发零售业等，人力资本积累丰富的人则会选择机会型创业、自我价值实现型创业，业务领域多为科技含量较高的行业，如信息行业等[38]。当存在期望投资、弥补人力资本损失等机会，以及满意收入预期、家庭因素、职业提升因素时，返迁劳动力数量增加，弥补和缩小包括收入差距在内的各种社会差距是其最重要的增收动机之一[39]。

社会资本。工作经历、人际网络、家庭关系等对创业绩效及收入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外出从事各种非农就业的职业经历，利于这一群体在资金、技术、企业家精神等方面的社会资本积累，进而对他们返迁后创业就业活动产生积极促进作用。社会资本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获得满意度较高的工作或创业机会，并且在收入保障以及增收方面产生正向影响[40]。

创业和就业环境。环境因素包括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经济环境等宏观环境因素，也包括行业环境、职场环境等因素，对返迁决策、创业动机和职业选择，收入影响是上述因素对返迁劳动力的重要影响结果之一。全球创业观察（GEM）的数据显示，经济和政治环境等情境因素、教育和感知能力等人力资本因素对创业者产生重要影响，其中，经济参与度以及专用性人力资本是影响创业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创业过程中，需要考虑机会成本对成为企业家的机会以及获得优良工作的机会产生的影响，而机会成本又受到环境因素以及人力资本的影响，积极影响可以促使收入水平稳定及增收[41]。

四、结语与研究展望

返迁研究是劳动力转移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其研究的理论起点源于发展经济学的劳动力转移理论，有影响力的相关研究成果几乎均来自于国外。这些成果触及返迁劳动力收入影响，成为进一步相关研究的基础。根据国外相关研究结果，结论上说，返迁为移民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伴随行为，这是一系列“力”作用的结果，其返乡影响源于多元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社会和经济环境下，迁移动因、收入差距、就业状态等均可影响返迁决策和行为。返迁劳动力收入影响因素可分为间接影响因素和直接影响因素，返迁决策影响因素为最重要的间接因素，直接因素包括返迁劳动力个体适应性、对返迁地的作用影响、职业选择外，最重要因素则源于特定的群体劳动力特征因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因素以及创业就业环境因素等市场因素，以上因素的作用结果形成返迁劳动力收入效应。

在总体现状上，上述国外研究具有明显的属性特性：多以移民为主要研究对象，鲜见以农村转移劳动力返乡者为对象的研究；多以返迁动因、价值行为、创业就业影响因素等为主要研究内容，少数研究结果在视角上较深层次触及到收入影响因素及其结果，同时关注个体特征（如人力资本），强调结构性因素对结果的影响，但缺少以收入保障以及收入增长为效应目标的研究；以规范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为主，趋于综合研究法；研究动态上，国外的成果数量呈减少趋势，研究方向受研究对象区域影响较大。

毫无疑问，在理论和应用上，国外研究成果对我国返乡劳动力及其收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基石和启示作用。今后，随着国内研究成果数量的不断增加，在研究对象上进一步聚焦于农村转移劳动力返乡者即返乡劳动力。理论上说，返迁劳动力具有外出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的双重属性，尤其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具有比较性优势。在此认识基础上，今后相关研究的方向和课题将聚焦于返乡劳动力群体及其收入问题，进一步研究结构性因素以及制度化路径等外生性框架对收入影响因素的控制作用，关注政策效应，探讨和解决在良好政策支持下如何通过生产经营活动，成为职业化的生产者或经营者，将群体优势转化为收入有利因素，并产生社会经济贡献效应等问题。

参 考 文 献

[1] 白南生，何宇鹏．回乡，还是外出？安徽四川二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2（3）：64-78.

[2] Herberle R. The causes of rural-urban migration：a survey of German theor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38，43（6）：932-950.

[3] 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1）：125-136.

[4] 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Social Studies，1954，22（2）：139-191.

[5] Lewis W A. *Reflections on unlimited labor，in DiMarco L. E. (ed.)*[M]. New York：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Elsevier，1972：75-96.

[6] Todaro M P.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59（1）：138-148.

[7] Wang X，Sun Y. The interpretation of‘migration puzzle’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capital differences[J]. Population&Economics，2015：211-222.

[8]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与顶层设计[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35-47.

[9] Ravenstein E G. The laws of migration[J].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1885（6）：167-235.

[10] Warren R ，Peck J M. Foreign-born emigr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1960 To 1970[J]. Demography，1980，17（1）：71-84.

[11] Dustmann C ，Weiss Y. Return migration：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UK[J].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2007，45（2）：236-256.

[12] Murpby R.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nral China*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125-134.

[13] Roca J D L. Selection in initial and return migration：evidence from moves across Spanish citie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17（11）：33-53.

[14] Haartsen T，Thissen F. The success-failure dichotomy revisited：young adults′motives to return to their rural home region[J]. Childrens Geograsighies，2014，12（1）：87-101.

[15] Verniers C，Vala J. Justifying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the worksiglace：the mediating role of motherhood myths[J]. SIGLoS ONE，2018，13（1）：1-23.

[16] Chetty R，Nhendren，kine，et al. 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 eunity？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J]. Nber Working Papers，2014，129（4）：1553-1623.

[17] Dako-GyekeMavis. We never plan to return home：voices of pre-migrant Ghanaian youth[J].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2016（19）：169-182.

[18] Massey D S. Understanding Mexican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7，92（6）：1372-1403.

[19] Gibson J ，Mckenzie D. The micr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emigration and return migration of the best and brightest：evidence from the Pacific[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1，95（1）：18-29.

[20] Reagan P B，Olsen R J. You can go home again：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data[J]. Demography，2000，37（3）：339-350.

[21] Hausmann R. Welcome home in a crisis：effects of return migration on the non-migrants wages and employment[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17，10（3）：101-109.

[22] Wang W ，Fan C. Success or failure：selectivity and reasons of return migration in Sichuan and Anhui China[J]. Enviromnent & Planning A，2006，38（5）：939-958.

[23] Zakharenko R. Return migration：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R]. Paper prepared for the fif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Hong Kong Economic Association，Chengdu China，December，2008：15-16.

[24] Saar M. To Return or not to return？ the importance of identity negotiations for return migration[J]. Social Identities，2018（1）：1-14.

[25] Haas D，Fokkema C. The effects of inte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ties on international return migration intentions[J]. Demographic Research，2011（25）：755-782.

[26] Zakharenko R. Return migration：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DOI：10. 2139/ssrn，1350375，2009.

[27] PeriI G. The impact of immigrants in recession and economic expansion[J]. Construction & Building Materials，2011（5）：166.

[28] Reichert C V，Cromartie J B，Arthun R O. Imsigacts of return migration on rural U. S. communities [J]. Rural Sociology，2014，79（2）：200-226.

[29] King R，Strachan A ，Mortomer J. Gastarbeiter go home：return migr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 in the Italian Mezzogiorno[J]. Return Migr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Problems，1986：38-68.

[30] Tverdostup M，Masso J. The labour market performance of young return migrants after the crisis in CEE Countriesahe case of Estonia[J]. Baltic Journal of Economics，2016，16（2）：192-220.

[31] Barcevicius E. How successful are highly qualified return migrants in the Lithuanian labour market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2016，54（3）：35-47.

[32] Meler T. SIGalestinian Women citizens of Israel working in agriculture-a retrossigective concerning Ibtisam

Ibrahim′s 1993 article"The Cucumber SIGickers"[J]. Israel Studies, 2018, 23 (2): 74-94.

[33] Gubert F , Nordman C J. Return migration and small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 the maghreb[J]. Diaspora for development in Africa, 2011 (3): 103-126.

[34] Yu L, Yin X, Zheng X, et al. Lose to win: entrepreneurship of returned migrants in China[M].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16: 1-34.

[35] Brack T, Mahe C, Naude W. "Return migration and self-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Kyrgyzstan"[J]. 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 2018, 10 (2): 1-43.

[36] Massey D S. Reflections on the dimensions of segregation[J]. Social Forces, 2012, 91 (1): 39-43.

[37] Lans T V, Galen M A, Verstegen J A, et al. Searching for entrepreneurs among small business owner managers in agriculture[J]. NJAS - Wageningen Journal of Life Sciences, 2014 (68): 41-51.

[38] Adom K , Asare Yeboa I T. An Evalu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ory and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in Sub-Sahara Afric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nder and Entrepreneurship, 2016, 8 (4): 402-423.

[39] Junge V, Diez J R , Schatzl L.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of internal return migration in Thailand and Vietnam[J]. World Development, 2015(71): 94-106.

[40] Shen Jing, Bian Yanjie. The causal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on income: a new analytic strategy[J]. Social Networks, 2018 (54): 82-90.

[41] Brush C, Ali A, Green P. The inlluence of human capital factors and context women entrepreneurship: which matters mor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vturing Insights, 2017 (8): 105-113.

Research on the income impact of the returned labor force: a perspective of foreign review

ZHOU Ping, QU Tao

(*Institute of Regional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labor-returning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Relevant foreign research results have a strong influence in this field. Therefore,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academic review, it is clearified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labor-returning is the accompanying behavior of labor transfer, which is the result of a series of "forces". The returning labor has the dual attributes of migrant labor and local labor, and has advantages in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Amo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ncome of the returned labor force, the decision-making factor of returning is an important indirect influencing factor, while individual adaptability, the effect of returning plac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bor force are the direct influencing factors, including group characteristics,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employment environment.

Keywords: Immigration; Labor transfer; Returning decision; Group characteristics; Income impact

（编辑：牛晓霞）